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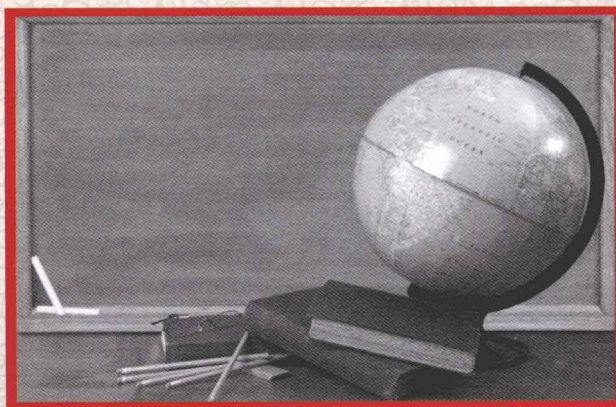


高等学校教师教育创新培养模式“十二五”规划教材

丛书主编：靖国平

中国教育史教程

主 编 赵厚勰 陈竞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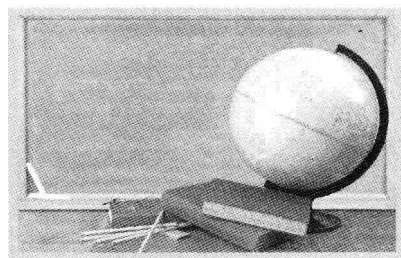


ZHONGGUO JIAOYUSHI JIAOCHENG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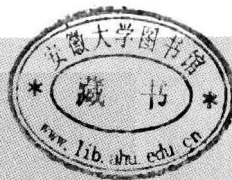


中国教育史教程

主 编 赵厚勰 陈竞蓉

副主编 兰 军 罗玉霞 胡朝阳

郑 刚 张利平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内 容 简 介

本书分为中国古代文教政策和教育制度、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与变革、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四个部分,共18章。全书以简史的形式,简要介绍了中国自先秦以来教育发展的历史,试图让读者从总体上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有所了解与掌握。本书既注意体系的完整性,也注意突出重点,行文尽量做到简明扼要,脉络清晰。出于增强可读性的考虑,本书精心搜集了一些中国教育史方面的小故事(或教育案例、教育心得),还精心挑选了一些中国教育名言,并选取了一些相关图片。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工作,进一步吸引读者对本书的阅读兴趣。本书既可用做教材,也可供自学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史教程/赵厚勰 陈竞蓉 主编.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609-7849-9

I. 中… II. ①赵… ②陈… III. 教育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G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8862 号

中国教育史教程

赵厚勰 陈竞蓉 主编

策划编辑:曾 光

责任编辑:华竞芳

封面设计:龙文装帧

责任校对:代晓莺

责任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57437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2.25 插页:2

字 数:275千字

版 次:201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25.00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教师兴则教育兴,教师强则教育强。当今世界,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创新教师教育培养模式,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共同目标。我国新近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加强教师教育,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大学参与、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创新培养模式,增强实习实践环节,强化师德修养和教学能力训练,提高教师培养质量。”

教材建设与开发是创新教师教育培养模式、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深化教师教育改革、提高教师培养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2009年6月,教育部启动实施“教师教育创新平台项目计划”,明确提出要努力创新教师培养模式,加强教师教育学科群建设,深化学科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组织一批教学经验丰富、研究成果突出的高校专业教师,根据教师教育创新培养模式以及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新形势、新目标和新任务,以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为平台,编写了“高等学校教师教育创新培养模式‘十二五’规划教材”,包括《教育学教程》、《心理学教程》、《现代教育技术教程》、《课程与教学论教程》、《中国教育史教程》、《外国教育史教程》、《教师伦理学教程》、《学与教的心理学》、《学校心理咨询与辅导》、《公关心理学》、《班主任工作艺术》、《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制作》、《教育科研技能训练》、《教师教学技能训练》和《教师语言艺术训练》共15本。

通过教材建设与开发创新教师教育培养模式,探索教师专业化成长之路,是一种新的尝试,也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本系列规划教材的编写,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精神为指导,在坚持教材编写的科学性、创新性、系统性、规范性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力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

(1) 在传承教育学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突出教师教育教材编写的实践取向。教师教育教材体系的变革,是当前创新教师教育培养模式的一个重要课题。教师教育教材的编写,既要体现系统、严密、扎实的教育理论知识,又要突出丰富、生动、具体的教育实践情境;既要注重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引入鲜活的实践领域,还要注意将日常实践经验导向富有魅力的理论阐释。其重点和难点在于达成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动态平衡和相互转化,并始终专注于教材的现实取向和实践立场,以克服理论脱离实

际、知识与能力相分离、所学非所用等方面的流弊。本系列规划教材的编写,力求在简明介绍、评述相关理论知识及其背景的基础上,凸显教材的实践取向和实用价值。如《班主任工作艺术》、《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制作》、《教育科研技能训练》、《教师教学技能训练》、《教师语言艺术训练》等教材,都充分体现了这种取向。

(2) 在坚持教材编写为教师服务的基础上,突出教材编写的学习者取向。任何教材的编写,既要考虑教师“教”的需要,也要考虑学习者“学”的需要,好教材通常是教师“好教”,学生“好学”,教学一致,师生相长。本系列规划教材的编写,力求在为从事教师教育的专业教师提供优质的课程与教学设计的基础上,坚持“以学习者为主,为学习服务”的基本原则。基于创新教师教育模式所要达成的目标,教师的“教”需要满足于学生的“学”,“教材”需要趋向于“学材”。尽管许多教材名曰“教程”,但我们更倾向于将它转化为“学程”,追求“教程”与“学程”的有机统一。同时,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注重学习资源与问题情境相结合、文字表述与图表呈现相结合、文本学习与思想交流相结合、知识掌握与能力训练相结合。

(3) 在坚持教材编写的普适性、通用性原则的基础上,突出教材编写的区域性特色。湖北是我国的教育大省,湖北教育尤其是教师教育在中部地区具有重要的比较优势与特色。未来 10 年湖北将努力从教育大省迈进教育强省,而教师教育必将是我省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点工作。本系列规划教材的编写者以湖北省属高校专业教师为主,旨在充分利用湖北省丰富的高校教师教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资源,以及广大中小学校教育改革的先进经验,凸显教师教育教材编写的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同时,也注意充分吸收其他地区教师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本系列规划教材的编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体劳动的成果。湖北大学、江汉大学、长江大学、三峡大学、湖北师范学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湖北民族学院、黄冈师范学院、孝感学院、咸宁学院、襄樊学院、荆楚理工学院、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 10 余所院校的百余名专业教师的热诚加盟,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领导和各位编辑的大力支持,各路同仁的精诚团结与通力合作,使本系列规划教材的编写得以顺利进行。编委会同仁深知编写系列规划教材是一件非常不易的大事,有的教材或许存在某些问题、差错,热诚欢迎广大读者及时加以指出,以便我们在下次修订时改正、完善。

本系列规划教材适用于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和综合性大学师范专业学生学习,同时可作为在职教师培训教材和专业教师教学参考用书。

靖国平

2010 年 11 月 30 日

前言

为适应国家高度重视师范教育的时代需求,作为“高等学校教师教育创新培养模式‘十二五’规划教材”丛书之一,我们编写了《中国教育史教程》。本书以时间为脉络,简要介绍中国自先秦以来教育发展的历史,以使读者从总体上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与掌握。本书既可用做教材,也可供自学阅读。

中国教育史涉及的范围很广,时间跨度很长,内容极其庞杂繁复。为了让读者较为明晰地认识中国教育的发展历史,本书在编写时力图做到简明扼要,脉络清晰。我们既注意体系的完整性,同时也注意突出重点,对非重点部分尽量压缩。在编写的结构安排上,我们以纵向历史发展为基础线索,但并不是简单遵循朝代更替或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来编写,而是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有机的整合。相信这种安排更有利于读者的阅读。

我们在编写的过程中,认真地参考和吸取了教育界前辈的成果,同时尽力做到搜求一手资料,准确反映教育史实,并注意将近年来教育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反映到教材中去,力求有新的突破。

《中国教育史教程》由赵厚勰、陈竞蓉担任主编,兰军、罗玉霞、胡朝阳、郑刚、张利平担任副主编。全书的写作框架主要由赵厚勰设计,各位主编参与全书统稿工作。参加本书的编写人员大多是多年从事教育史学科学习和研究的、经验丰富的高校教师,他们是(按章节顺序):赵厚勰(湖北大学,前言、第十三章)、兰军(江汉大学,第一、二、三章)、郑刚(华中师范大学,第四、五章)、杜天波、贺双(长江大学,第六章)、陈竞蓉(长江大学,第十四、十五、十七、十八章)、苏星(湖北大学,第七章)、罗玉霞(孝感学院,第八、九章)、胡朝阳(咸宁学院,第十、十一、十二章)、张利平(武汉大学,第十六章)。湖北大学吴中齐也参与了部分写作工作。书中的教育名言、教育启示录以及插图主要由赵厚勰搜集整理,张艳丽协助做了一些工作。

阅读历史的人是睿智的,阅读历史也能让人变得更加睿智。“读史使人明智”,学习和研究历史越久,对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这句话体会越深。教育中的许多现实问题,其实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希望从事教育史学习和研究的读者,以及一切对教育史感兴趣的读者,能通过阅读这本书得到一些收获。

本书的出版得到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本书的出版时间一再延后。曹胜亮主任屡次督促本书的编写工作,让我们感到肩上所负的责任,同时也感受到了他的宅心仁厚;责任编辑华竞芳为书稿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

勤的劳动。湖北大学教育学院领导也多次关心本书的进展情况,丛书主编靖国平教授经常督促本书的写作。本书的编排体例也受益于周洪宇老师的精心指点。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一定存在一些缺点、错误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赵厚鋈

2012年1月于沙湖之滨

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文教政策和教育制度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教政策	(3)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文教政策	(3)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文教政策	(5)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教政策	(8)
第四节 隋唐的文教政策	(9)
第五节 宋元明清时期的文教政策	(11)
第二章 中国古代官学	(17)
第一节 官学的雏形	(17)
第二节 汉代官学的确立	(20)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的中落	(22)
第四节 隋唐官学的复兴	(23)
第五节 宋元官学的发展	(25)
第六节 明清时期官学的衰落	(31)
教育启示录1 孔子误会颜回	(34)
第三章 中国古代私学	(36)
第一节 私学的创建与发展	(36)
第二节 私学的类型	(37)
第三节 私学的教学内容	(39)
第四章 中国古代书院	(41)
第一节 书院制度的历史演变	(41)
第二节 书院制度的教育特点	(47)
教育启示录2 孟母三迁	(50)
第五章 中国古代科举制	(51)
第一节 科举制度的起源与演变	(51)

第二节 科举制度对社会的影响	(60)
----------------------	------

第二部分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第六章 中国先秦时期的教育思想	(65)
第一节 孔丘的教育思想	(65)
第二节 墨翟的教育思想	(68)
第三节 孟轲的教育思想	(70)
第四节 荀况的教育思想	(73)
第五节 《学记》的教育思想	(76)
教育启示录3 给父母的信	(78)
第七章 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思想	(79)
第一节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79)
第二节 王充的教育思想	(81)
第三节 嵇康的教育思想	(83)
第四节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84)
第八章 中国唐宋时期的教育思想	(87)
第一节 韩愈的教育思想	(87)
第二节 柳宗元的教育思想	(90)
第三节 朱熹的教育思想	(91)
教育启示录4 知识的价值	(96)
第九章 中国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	(98)
第一节 王守仁的教育思想	(98)
第二节 王夫之教育思想	(100)
第三节 颜元的教育思想	(102)

第三部分 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与变革

第十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教育	(109)
第一节 洋务教育	(109)
第二节 从维新运动到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	(114)
第三节 民国成立初期的教育	(119)
第十一章 从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教育	(122)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教育的批判	(122)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发端	(125)
第三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	(127)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教育	(131)
教育启示录 5 陶行知的四块糖果	(134)
第十二章 中国近现代学制沿革	(136)
第一节 癸卯学制	(136)
第二节 壬子癸丑学制	(139)
第三节 1922 年的壬戌学制	(142)
教育启示录 6 三毛被罚	(146)
第十三章 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学校教育	(148)
第一节 基督教学校的缘起与初期概况	(148)
第二节 清末民初以来基督教学校的发展	(150)

第四部分 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

第十四章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155)
第一节 生平及教育活动	(155)
第二节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156)
教育启示录 7 破格录取	(160)
第十五章 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的教育思想	(161)
第一节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161)
第二节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164)
第三节 严复的教育思想	(167)
第十六章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170)
第一节 生平与教育活动	(170)
第二节 五育并举、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	(171)
第三节 对北京大学的改革	(172)
第十七章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175)
第一节 生平与教育活动	(175)
第二节 生活教育理论	(176)
教育启示录 8 陶行知喂鸡	(180)
第十八章 陈鹤琴的教育思想	(182)
第一节 生平和教育活动	(182)
第二节 活教育理论	(183)
教育启示录 9 春晖中学	(187)

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文教政策和教育制度



Ⅰ 教育名言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孔子)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荀子)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管仲)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颜之推)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朱熹)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 (张载)

身教重于言传。 (王夫之)

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 (李贽)

文教政策是一个国家对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决定了教育的发展方向、水平和重心。自先秦至清代,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制定和施行文教政策,其出发点都是培养统治阶层所需要的忠臣驯民,以发挥文化教育对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中国古代历朝的文教政策对各朝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文教政策

从新石器文化时代,到夏商周三代,再到春秋战国,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华夏文化。在这个文化体系中,教育占有十分显著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原始到文明、从依附到独立的发展过程。随着教育的逐步发展,先秦时期的统治者制定了维护朝代稳固的文教政策。

一、夏代“以射造士”的文教政策

夏代(公元前 21 世纪—前 16 世纪)是文献记载中中国最古老的朝代,是国家形态的最初形成时期。这一时期,文化教育事业初步摆脱原始蒙昧的羁绊,文化教育制度进入初创阶段。中国先秦时代的教育自此以夏代教育为底蕴,开始孕育、生长和扩充。

夏代是一个动荡、战乱和征伐不断的朝代。氏族间的仇杀、王室与周边部族、方国间的战争连续不断。夏代国君想拥有的权力与地位必须依靠武力来维持。为适应这种政治需要,统治者极为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史料中有许多夏代重视军事教育的记载。《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伐。”就是说夏后启曾在大乐之野,教授人们操练“九伐”之舞。这种“九伐”之舞,一击一刺为一伐,“九伐”即九个回合,可见这种“九伐”之舞,实际上就是一种武术操练。弓箭是当时战争中的主要武器装备之一,培养善射的武士是统治者的要务,“以射造士”便成为夏代教育的重要特点。

夏代是一个崇尚鬼神、重视祭祀礼典的朝代。《礼记·表记》记载:“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在宗教祭祀活动中,统治者借助追思前辈推动文明进步的历程、创造丰功伟绩的活动,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宗教活动中的仪式熏陶,还能够起到维护人伦社会的等级秩序的作用。

二、商代“尊神重孝”的文教政策

商代(公元前 1600 年—前 1046 年)是奴隶制社会趋于鼎盛的时期。由于汉字系

统的成熟和典册的出现,导致具有初步学校形态的学、庠、瞽宗等教育机构形成,促使商代的教育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商代统治者推行“尊神重孝”的文教政策。《礼记·表記》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商代,世人举凡日常起居、生老病死、农务战事,都须请巫师占卜以询鬼神。因而传授尊神重孝的宗教知识是教育的主要内容。殷人的祖先是至上神——帝。在《殷墟卜辞》中,可以看到帝的权利极大,它主宰着整个自然界和人间。培养年青一代对祖先神的崇拜是商代教育的重要目的。

三、西周“尊礼”的文教政策

西周(公元前 1046—前 771 年)是中国奴隶制的鼎盛时期,也是奴隶制学校教育发展的全盛时代。西周实行分封制,形成了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在思想意识上由重鬼神逐渐变为重人事。

“尊礼”是西周统治者推行的政策。《礼记·表記》曰:“周人尊礼尚施。”所谓礼,一方面包含宗教和行为的仪表,如人与人交接中的礼节以及冠、婚、丧、祭等典礼,其目的在于分尊卑、别上下;另一方面包含“敬德保民”的思想。敬德保民的思想是由周公提出的。周公认为,上天只协助那些有道德的统治者,而统治者有没有道德,主要是体现在统治者是否“从民之欲”,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①。这说明了“天命”与“民欲”的一致性。“敬德”,即服从“天命”;“保民”,即安抚奴隶。“保民”是“敬德”的体现。由此,等级名分观念的培植成为西周教育的重心。

夏商周三代,由于教育是同政治、宗教、军事等各种现象糅合在一起的。因此,文教政策也与政治、宗教、军事等政策糅合在一起。

四、春秋战国时期“以礼为文,以戎为主”的文教政策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70—前 221 年),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维系宗族血缘的宗法制度已失去控制能力。在政治上,王权衰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以礼为文,以戎为主”为这一时期诸多诸侯国在国策选取方面的总体特征。

随着各国诸侯势力逐渐壮大,纷纷立国。各国诸侯和公卿大夫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增强自己的影响力,都争相培养和扶植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技能的人为自身的利益服务,由此养士之风大兴。由于士需要经过一定的学习和训练才能造就,因此人们就需要拜师求学,这就促进了私学的发展。私学促成了各派学说的成熟。各家为展其所长,或著书论辩,或驰说奔竞,由此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① 《左传》哀公三十一年引《泰誓》。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文教政策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封建国家形成和确立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文教政策的探索和确立时期。文教政策经历了由秦朝法治教育到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德治教育的转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教育传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一、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

秦代(公元前 221—前 206 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为了巩固统一的政权,维护秦王朝的长治久安,秦始皇采取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统一而专制的做法。

(一) “书同文”、“行同伦”

秦初,为消除春秋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①的现象,以利于秦政令的统一推行和政权的巩固,采取了“书同文”政策,也就是文字的统一工作,采取以小篆为文字形体的标准。这一做法不仅为秦朝政策法规的顺利推行扫除了障碍,也为文化的传播、教育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行同伦”就是匡正异风异俗,改变原六国贵族的风尚习俗、道德和思想,以合乎秦朝的法度,教化百姓,使全国人民统一法度、统一思想。为达到这一目的,秦始皇曾五次出巡,每次巡行都以东方六国旧地为主,一方面是向天下显示皇帝的权威功绩,震慑吏民;另一方面就是宣扬法度,匡正异俗。这一政策的推行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

(二) 设三老以掌教化

秦实行郡县制,县下有乡。“三老”是乡官之一,多为民间有文化的人,充当教师的角色。“三老掌教化”,即三老负责向乡民宣教统治阶级的思想、法度、纲纪、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这是秦统治者为了把“行同伦”的政策贯彻落实到基层所采取的一项劝导、教化措施。

(三) 禁游宦

所谓游宦,是指通过游说宣传自己的主张,以达到从政做官的目的的知识阶层。秦统治者认为,游宦的上串下联,物议纷纭,传播自由思想与主张,不利于秦的一元化政治的实施,甚至有颠覆朝政之害,于是明令禁止。

(四) 禁止私学、焚书坑儒

在六国趋于统一的过程中,秦代统治者意识到思想统一和君主权力集中的重要

^① 《说文解字·序》。

性,认为私家学派的存在会造成思想的杂乱,若任由私家学者们自由发表言论,必将惑乱人心,所以有必要剥夺私家学派存在的权利。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 年),李斯提议禁止私学。他认为私学师古非今,扰乱视听,非议法教。每当朝廷令下,诸子百家各以其学说妄加议论,如果不加以制止,必然削弱君主的权威,而且会给结党乱政创造条件,因此私学必须予以取缔。禁私学的具体措施就是颁布书律:“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①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禁止私学。

秦始皇嬴政三十五年(公元前 212 年),儒士侯生、卢生指责秦始皇为人刚愎自用,狂妄暴戾,专意任用刑狱之吏,施行重刑杀戮政策,使满朝文武百官畏威而不敢直言进谏。侯生、卢生等人的抨击使秦始皇大怒,下令审问诸生。诸生忍受不住刑讯,彼此互相告发,导致有罪名者 460 多人,秦始皇命令皆坑之咸阳,以警告后人,这就是坑儒事件,与焚书事件合称“焚书坑儒”(见图 1-1)。



图 1-1 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对于统一思想或许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这是秦朝为钳制异端邪说、扼杀民间学术活动所采取的极端政策。

(五)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秦统治者主张对社会实行普遍的法治教育,认为百姓知法才会守法,社会才会安定;官吏知法执法,就不会残害百姓。无论吏民,都要教其知法、畏法、守法,这样国家就必然会富强安定;如此才能使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法令深入人心、妇孺皆知。为此,在秦代唯一允许学习的就是法令。李斯向秦始皇建议:“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②“以吏为师”体现了法家推行法治教育的实施手段,即为了实现法治,选择那些知法的官吏向全体人民传达和解释统治者制定的法令。这样,社会上所有的人都会以统一的标准来理解法令,做到依法行事。通过“以法为教”、“以吏为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见《史记·李斯列传》。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师”，官学成为秦时的主要办学形式。

秦在文化教育上所采取的措施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对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文化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过，吏师制度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倒退。

二、汉代确立“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汉(公元前 206—220 年)自成立到武帝以前的 60 多年中，统治者推行“无为而治”的政策。汉武帝上台后，为进一步巩固王朝的统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改变自周朝末期以来法家的统治路线，主张行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的儒家治道根本。汉武帝时期，将儒家经典列为官学，设置五经博士，公开“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及文学儒者数百人”，标志着“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由此，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了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确定了中国封建教育崇尚儒家思想的基本内涵。

“独尊儒术”的基本内容是要求国家政策和文化教育皆以儒学为本，并以儒学为统一的指导思想来培养和选拔人才。非儒的其他学说只能在民间传播，不被纳入国家正规教育系统，非儒的学者也不能进身仕途。为确保儒术“独尊”，汉朝统治者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

(一) 设五经博士

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 136 年)，朝廷专门设置五经博士来研习《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种儒家经典。“博士”是中国古代学官名。战国时已有博士，秦汉承袭此制。博士的职责是掌管典籍簿册、通古今、待问咨询、议礼仪政、充任吏师教授弟子。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 7 人，至东汉五经博士 14 人定为制度，汉元帝时增加为 15 人。汉代对博士的资格要求很高，只有经学名流、权威才能担任，必须是明儒学、尊儒道的楷模。

(二) 兴太学

太学是汉代的最高学府。兴办太学的建议最初由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提出。董仲舒提出国家不但要“求贤”，更重要的是要“养士”。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 年)，朝廷根据丞相公孙弘拟订的实施博士弟子制度的具体办法，由朝廷为五经博士选置弟子，有固定的名额和选拔标准，并享有官方给予的待遇，这就是博士弟子制。这一制度的实行，标志着太学的正式设立。

太学初创时只有博士弟子 50 人。到汉成帝时，已发展到 3 000 人。汉顺帝时，由于左雄、翟酺上书建议，重新修缮了太学校舍，并扩建了 240 房、1 850 室。从此，来太学求学的人数日益增多。至汉质帝、汉桓帝时，太学生已达 30 000 余人。直到东汉末年，太学生经常保持 30 000 余人。

(三) 以儒术取士

两汉时期教育昌盛，与劝以官禄的政策密不可分。汉武帝时逐步确立了以察举为主的取士制度。在取士标准上，突出强调精通儒术和具有儒家伦理道德修养。察举最盛的孝廉科，就是选取具备儒家的“孝”、“廉”美德的人士，而明经科则是专取通